

自序

時間過得很快，從2009年我發表第一篇有關馬戛爾尼使團的文章算起，到今天出版這本小書，轉眼已過十多年了。不是什麼十年磨一劍，因為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完全把這題目放下了，直到大約五年前，想整理一些舊作以出版論文集，才重看從前三篇有關使團的文章。本來以為只需稍作修補便可，但竟然是一發不可收。仔細查閱資料後，發現不但可以補充的地方很多，就是一些主要觀點也需要修正，再加上四處搜尋一些較少人知道和利用的資料，結果，花上四年多的時間才算竣工。

想在這裡先交代一下撰寫本書的背景和想法。

儘管我的學士學位是翻譯，且從1988年開始便一直在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任教，但我原來的研究領域是20世紀中國文學，尤其集中在1930年代左翼文學運動，出版過一些有關魯迅、左聯、新月派以及文學史書寫的論文和專著。1990年代初開始，在讀過一些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理論後，我的學術生涯出現一個重大的轉變：從文學研究到翻譯研究，那是因為我開始認識到翻譯在人類文化和歷史發展上的真正意義和價值，讓我願意把所有的學術時間和精力用在翻譯研究上。當然，我並不否定文學研究的重要性和價值，誰也不能想像一個沒有文學的世界會是怎樣的。但文學研究在學術界一直都得到重視，已出現很多傑出的學術成果，但翻譯研究呢？在過去一段很長的日子裡，有關翻譯的討論大

多屬於原著中心，只是反覆提問譯文能不能表達原文的意思，讀來是否通順流暢。這是一種翻譯批評式的討論，當然不能說完全沒有作用或價值，一些出色的討論對於學習如何做翻譯是會有幫助的，但這屬於翻譯實踐和教學的範疇，不能算是嚴格意義的學術研究，更沒法展示翻譯在人類歷史和文化發展上的角色和貢獻。這點我在不同地方都說過，就不再浪費筆墨了。

在走上翻譯研究的道路後，最初的階段很自然地集中在文學翻譯方面。借助從前在文學研究方面的訓練和積累，轉向文學翻譯研究是較為順利的。我第一本翻譯研究論著《重釋「信、達、雅」：20世紀中國翻譯研究》中的好幾篇文章，都是環繞魯迅、瞿秋白、梁實秋等20世紀翻譯家和理論家開展討論的，而且也很快走向晚清，梁啟超和林紓的文學翻譯成為我研究的對象，當然也離不開嚴復。

但是，文學翻譯在中國近代翻譯史其實來得最晚。在梁啟超提出「譯印外國小說」前，嚴復已翻譯出版《天演論》，產生極其重大的影響，更不要說自1860年代開始的洋務運動，絕大部分的翻譯活動幾乎完全跟文學扯不上關係。此外，即使梁啟超等倡議的文學翻譯，在動機上與洋務運動和《天演論》等翻譯活動也有共通的地方，就是通過翻譯引入西方新知識、新思想，作為國家富強的手段。所以，自1860年代以來，甚至包括民國時期的種種翻譯活動，政治性都非常強烈，跟國家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更在歷史發展上扮演了非比尋常的角色，成為影響中國近代史的重要元素。我在2011年出版的《翻譯與文學之間》，雖然還是以文學翻譯為主，但也收入非文學翻譯方面的研究，包括廣州體制的通事、同文館、晚清翻譯活動的贊助人如林則徐、恭親王等。

其實，自明末開始，中國歷史其中一個關鍵性的轉變就是歐洲人的到來。在中西方不同層面和領域的交往中，要達致有效溝通和交流，翻譯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除上面提到以富國自強為目標的西籍翻譯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外交往過程中所出現的翻譯活動。可以說，

要準確地理解近代中外交往的歷史，甚至整個中國近代史，就必須認識翻譯的角色。不過，令人頗感遺憾的是：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裡，翻譯幾乎完全沒有進入歷史研究的視野，就好像所有的中外交往過程中都沒有需要借助翻譯、又或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翻譯似的，更不要說認真處理當中因為翻譯而引起的一些問題。這固然與歷史事實不符，不但隱沒了翻譯在歷史發展中所曾發揮的重大作用，更妨礙甚至損害我們對歷史正確和深入的了解。說得嚴重一點：不正視翻譯在近代中外交往史上的功能和影響，根本不可能準確地理解近代中外交往史。

就是在這樣的理解下，大約從2003年開始，我進入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就是翻譯在近代中英外交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一篇發表的論文就是與本書相關的〈馬戛爾尼使華的翻譯問題〉。作為英國第一次遣使來華，馬戛爾尼使團毫無疑問是中英關係史上其中一樁影響最深遠的事件，當中涉及的翻譯問題很值得深入研究。馬戛爾尼使團以外，我在最近十多年把研究對象擴展到中英關係史上其他重要的課題，諸如阿美士德使團、廣州貿易體制、律勞卑事件等，也比較集中地探討翻譯在鴉片戰爭的角色。2014年出版的《翻譯與近代中國》，收錄的全是與晚清時期相關的文章，其中只有一篇是屬於文學翻譯方面的，其餘都涉及中英交往的課題，很大程度上呈現個人向近代政治史、外交史的轉變。近年重點研究對象則是鴉片戰爭，也發表了一些文章，探討這場改變中國歷史的戰爭中的譯員、條約談判的翻譯活動和譯本問題。

至於馬戛爾尼使團，繼2009年的〈馬戛爾尼使華的翻譯問題〉後，我在2013年發表了兩篇文章：〈「張大其詞以自炫其奇巧」：翻譯與馬戛爾尼的禮物〉及〈大紅毛國的來信：馬戛爾尼使團國書中譯的幾個問題〉。前者是為一次有關贈送禮品的學術會議而寫，後者則以英國國家檔案館外交部檔案所藏、由使團自己準備和帶到中國來的國書中譯本為對象，探討使團所準備的國書中譯本的譯者及書寫問題。儘管這譯本的政治作用和歷史意義非比尋常，但從沒有得到學者的關注和討論。這三篇文章可以說是本書的源頭，但在閱讀更多原始資料後，我花上超過四

年的時間重寫，才完成這部30餘萬字的專著，除增補幾個新部分外，還修正了從前的一些論點，希望能為馬戛爾尼訪華使團相關的翻譯問題和現象提供較全面和準確的研究。

不過，這部探討馬戛爾尼使團翻譯問題的專著不應該只限於翻譯研究或所謂外語系統的讀者，雖然本書好像全在討論翻譯和語文的問題，但其實處理的是一個歷史個案，是中英關係史上其中一樁最重要的歷史事件。本書選擇以翻譯作為切入點，是因為翻譯在這事件中的確扮演關鍵角色，不容忽視；可惜的是長久以來大部分的研究對此隻字不提，把翻譯的角色隱去，這是對馬戛爾尼使團作為歷史事件的研究的嚴重不足。本書就是希望能夠在這方面作點補白的貢獻。

說來慚愧，一晃間已有六年多沒有出版論著了，首先想說明的是為什麼會把這本小書呈獻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終身名譽校長徐冠林教授。在過去的學術生涯裡，個人出版過十餘種的專著和論文集，這是第一次作呈獻。徐校長在2006年把我聘請到南洋理工大學，出任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創院院長，2007年轉任文學院創院院長，讓我在四年全職大學行政位置上大大地豐富了人生的閱歷。知遇之恩，一直銘記在心。不過，把小書呈獻給徐校長不單出於個人的感激，而是要對於一位大學教育工作者表達崇高的敬意。徐校長是軍事科技工程的專家，曾任新加坡國防科技局局長；此外，南洋理工大學一向以理工科馳名國際，位居世界前列。徐校長在2003年掌管南洋理工大學後，即馬上籌辦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而在我出任院長期間，他對人文學科的大力支持和信任，更遠超我的預期。在多次的交談和討論中，知悉他有非常明確的信念：人文學科在一個國家、民族、社會和文化的發展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國家民族的興盛與衰亡、社會文化的進步或落伍，與人文學科是否受到重視息息相關。十分有意思的是，作為工科專家，他經常說，沒有人文學科修養的工科生以至科學家是沒有靈魂的。這一句話可能開罪不少人，但當中的意義不是很值得深思嗎？徐校長的眼光和胸襟不是讓人深深敬佩嗎？

個人方面，也很想借此機會對多年來提點和支持的眾多師友表示謝意。首先要特別感謝的是鄭樹森教授。儘管他的研究領域不在翻譯或中國近代史，但他淵博的學識和睿智的思辨力，讓我每次跟他的交談都是豐盛的學習機會。在過去的二三十年裡，他從不間斷地給我提點和指導，還有大力的支持和鼓勵。無論是學術上或人生路途上，每遇到困難或疑惑，我總是最先想到向他請教求助，每次他總能提供很好的意見和解決方法。拙作今天面世之際，容我表達最衷心的謝意。張曼儀、卜立德 (David Pollard) 兩位老師，劉紹銘和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兩位師長，他們長年的教誨，引領我走上學術的路，指示我人生的方向；黃克武、鄒振環、沈國威、陳力衛、楊承淑、羅崗，都是近現代思想史、文化史、語言學史、跨文化研究和文學研究的專家，有幸與他們交往多年，令我獲益良多，更要感謝他們長期支持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和翻譯系所辦的活動，在各方面都是很大的推動力；陳思和、王曉明、千野拓政、孔慧怡、王德威、奚密、陳子善、沈衛威、劉樹森、柴明穎、陳平原、李天綱、王東風、朱志瑜、李爽學、吳偉諸位，都是認識二三十年的摯友；還有中學或大學年代就認識，一起在學術圈成長的容世誠、陳金樑、陸鏡光、陳清僑、李小良、楊永安等，近年不一定能夠經常聚首暢聊，但偶爾的一次碰面、簡單的一句問候，總能讓我享受良久的暖意，叫我煩燥急亂的心境馬上平靜下來。更難得是認識了不少「西方友人」：胡志德 (Theodore Hutters)、司馬富 (Richard Smith)、Timothy Barrett、傅熊 (Bernhard Fuehrer)、傅佛果 (Joshua Fogel)、梅謙立 (Thierry Meynard)、范岱克 (Paul A. Van Dyke)、費南山 (Natascha Gentz)、賀麥曉 (Michel Hockx)、安如巒 (Roland Altenburger)、顧有信 (Joachim Kurtz)、Peter Kornicki、Susan Bassnett、Theo Hermans、Mona Baker、Judith Wordsworth，他們都是國際上中國研究和翻譯研究的頂尖人物，認識很多年了，且早已不只是學術上的朋友，我從他們那裡得到的當然也不限於學術知識。特別要感謝梅謙立，我在一些拉丁文和法文文獻的翻譯問題上曾多番叨擾，得他慷慨地協助校正。

除了這些多年的老朋友外，在近年才認識的，甚至主要是因為馬戛爾尼使團這個項目才認識的，還有幾位很重要的朋友。首先要向幾位意大利學者表示極大的謝意。我從前沒有全面開展馬戛爾尼使團的研究，是因為早已知道一批有關使團譯員李自標和柯宗孝的資料收藏在意大利。雖然幾年前曾專誠跑到梵蒂岡宗座圖書館，希望能找到一些相關材料，但苦於外語能力的限制，面對拉丁文和意大利文的檔案目錄，頓時變成實實在在的「文盲」，最後只能空手而回。2013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主辦的一次會議中認識了羅馬大學 (Sapienza Università di Roma) 的伯艾麗 (Alessandra Brezzi) 教授，再經她介紹認識了安德偉 (Davor Antonucci) 教授，以及那不勒斯東方大學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Napoli “L’Orientale”) 樊米凱 (Michele Fatica) 教授和 Sergio Muzzupappa 博士。本來，早在幾十年前第一次到意大利旅遊時便已經體驗過意大利人熱情好客、樂於助人的態度，但當我2018年到羅馬和那不勒斯查找馬戛爾尼使團的原始資料，他們的盡心幫忙更只能用「叫人感動」來形容。樊米凱送我幾部著作和文章；Sergio Muzzupappa 直接把整理好的相關資料複製給我；安德偉除介紹我認識當時在傳信部檔案所在的伍爾班大學漢學研究中心 (Centro Studi Cinesi, Urbaniana University) 工作的 Emanuele Raini 博士外，更在百忙中整天陪我在梵蒂岡傳信部檔案館 (Archivium Propaganda Fide) 翻查檔案目錄——更準確地說是他翻查目錄，為我找出有用的資料，怎能不令人感動？此外，伯艾麗的博士生 Silvia Nico 為我翻譯意大利文獻以及安排與 Jacopo Dellapasqua 合譯拉丁文文獻，還協助在羅馬其他的檔案館找尋相關資料，佔去她很多寶貴的學習時間。另外2019年夏天才認識在波士頓大學任教的梅歐金 (Eugenio Menegon) 教授，他專注於清初天主教在華活動，也是意大利人，同樣熱心助人，好幾次為我解答有關天主教檔案的疑問，甚至親自為我翻譯一篇文獻，在這裡也要好好向他致謝。

還有牛津大學的沈艾娣 (Henrietta Harrison) 教授。幾年前，我已知道她在撰寫馬戛爾尼使團「童子」小斯當東和譯員李自標的聯合傳記。2018年7月，在讀過她那篇有關馬戛爾尼使團禮品的文章後，我寫信向

她請教，開始了這兩年多來經常進行、非常有用的討論。然而，直到今天，我們還是緣慳一面，雖然她曾經嘗試安排我到牛津大學做講座，我也邀請她來香港參加會議，但最終雙方都無法成行。不過，正如她在其中一封信裡所說，我們用上很多的時間去細讀對方的著作，感覺上就是很熟悉的老朋友。最為難得的是她絕無同「題」如敵國的計較，毫不吝嗇地與我分享研究資料，甚至把好幾頁的研究筆記送過來。這是一種學術上的自信和大度。當然，本書借用她的資料和觀點的，我會在適當位置鳴謝，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特別要致謝的更有大不列顛及愛爾蘭皇家亞洲學會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的 Edward Weech 博士。好幾年前，我在研究第一位到達西藏拉薩的英國人萬寧 (Thomas Manning) 時，曾到倫敦的學會檔案館查找相關資料，得到過他慷慨的幫忙。最近他知悉我在研究馬戛爾尼使團後，便送來兩冊小斯當東收藏贈與皇家亞洲學會的中文文書抄本，沒想到當中包括了幾篇我過去幾年一直千方百計、四處尋找的資料：馬戛爾尼使團自己所準備的一些中文譯本，包括喬治三世給乾隆的國書、禮品清單中譯本、馬戛爾尼致和珅的信函等。這些資料彌足珍貴，除國書中譯本外，暫時還不見於其他地方，就連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清宮檔案裡也沒有。在收到這些資料時，我的興奮和感激之情，可想而知。在這裡，容我表達衷心的謝意。

必須提到的還有好幾位現在已經不算年輕的「年輕人」：雷啟立、倪文尖、毛尖、查明建，認識他們也很久了，當時他們都只是20歲左右的小伙子，看著他們成長、發展，今天都獨當一面，成就驕人，真叫人高興，和他們暢談，讓我「不知老之將至」。另外還要特別感謝台灣中興大學的游博清，他是一位非常嚴謹的年輕學者，曾慷慨地提供過一些重要的研究資料。

談到研究資料，在研究馬戛爾尼使團的過程中，我從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和翻譯研究中心都曾拿到一些研究經費，供聘請研究助理之用。我在這方面真的

比較幸運，先後得到幾位既勤快、又負責任、做事認真的助理協助查找和整理資料，以及幫忙整理書稿，為我減省很多時間，在這裡向陳胤全、裴凡慧、張思楠、高心雲、梁凱晴、蔣之涵、魏華容、李穎欣致謝。

在過去的十餘年裡，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復旦大學、南洋理工大學和上海外國語大學招收了30多名博士生，他們有些已經畢業，在不同的院校任教，也有才剛開始，三數年後才能拿到博士學位的。不管怎樣，很高興有這些學生，教學相長，我在指導他們寫論文的過程中，是最大的得益者，而且，他們很多都在不同事務上無償地提供協助，更不用說與他們一起總是充滿歡樂。我想在這裡也記下一筆，雖然不能一一提名了。

這本小書得以出版，還要衷心感謝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的同事，他們除了在日常工作上提供很多幫忙和便利外，還協助校對和出版方面的具體工作；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甘琦和她的團隊，尤其是編輯葉敏磊和張煒軒，既專業又能幹，這本小書能在這所享譽全球的出版社出版，很是榮幸和高興。經費方面，翻譯研究中心的「研究項目經費」提供了2018年到意大利的研究費用；另外本書有關廣州公行和通事部分，得到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的資助，是2016–2017年度「優配研究金」(General Research Fund)項目“Translation and the Canton System in Sino-British Relations”的部分研究成果，也在這裡致謝。同樣要說明的是本書部分章節曾在不同期刊上發表，謹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翻譯史研究》、《翻譯史論叢》、《復旦談譯錄》和《外國語言與文化》的主編和全體工作人員表示衷心的感謝。

另外，本書開首所收插圖，絕大部分從沒有在公開出版書刊中出現過，彌足珍貴，謹向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英國皇家檔案館(The Royal Archives)、大英圖書館(The British Library)、大不列顛及愛爾蘭皇家亞洲學會、梵蒂岡宗座圖書館(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梵蒂岡傳信部檔案館、那不勒斯東方大學等機構致謝。

上面對於一些在各方面曾給我支持和幫助的師友、同事和學生的致謝，實在太像流水帳了，沒法表達我衷心的感激，更恐怕有掛一漏萬的情況，在這裡懇請包容和原諒。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還有家人。我至誠地感恩，一直以來，上天賜我幸福的家庭。六十多年前來到這個世界，我得到父母特別的寵愛，讓我在一個充滿關愛、溫暖和歡樂的家成長。在我25歲那年，媽媽猝然離開，爸爸也在2002年去世。劬勞未報，是終身沒法救贖的罪孽，只有時刻告誡自己，一定要努力工作，正直做人，希望有一天能夠做出一丁點可以讓他們感到安慰的成績。

還有在人生中一直推動我積極前行、與我一起生活超過四十年的燕珍。我常說，學者的太太最難為。雖然我們不用每天定時上班，但這只不過是說周六、日和晚上都是工作時間。對於自己時常以研究和寫論文為借口，逃避家務，剝削陪伴的時間，心中是充滿愧疚的。更感激的是她帶給我三個兒子，費盡精力和心思，讓他們在溫暖舒適的家庭中長大。今天，三個孩子都已成家，各自有著尚算不錯的事業，三個兒媳婦善良漂亮，闔家幸福快樂，這也是我滿懷感恩的理由。這幾年，最多的歡樂是來自兩個小孫兒晞瑜和澤菀，只要見到他們，一切的煩惱都立刻消失，完全地浸淫在心滿意足的甜蜜裡，而讓我倍感幸福和幸運的是剛添了小孫女兒珞曦。祝願他們永遠健康快樂。

王宏志

2021年母親節初擬

2021年中秋節修訂

2022年2月22日充滿愛的一天補記